

從經濟問題看中日關係

張隆義

一、前

言

中日兩國同位於東亞地區，由於歷史和地理上的關係，其在政治、文化、經濟以及安全保障上都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雙方精誠合作時則各蒙其利，雙方衝突對立時則各受其害。不管雙方心裏喜不喜歡，這種關係都是無法加以切斷的。

戰後在自由民主陣營和共產極權集團的對立中，中華民國始終站在反共的第一線，並和日本、韓國構成東亞的防線，共同阻擋共產勢力的擴張。日本雖然與美國訂有美日安保條約，藉美國的軍隊來保障其安全，但也賴中華民國和韓國爲其屏障，才能在戰後享受長期的安定和繁榮。尤其中華民國控制着由東北亞通往東南亞的要衝之地，確保臺灣海峽的安全，亦等於保障日本海上生命線的安全。因此，臺灣地區的安全若受到威脅，日本亦將面臨重大的危機。照理說，日本應該和中華民國加強團結，共同阻止共產勢力的擴張才對；但不幸地，到七十年代以後，日本因受美國「以中共制蘇俄」策略的影響，也採取了親近中共的政策。

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森的訪問中共，頗使日本感到意外。性急的日本政府受此刺激，乃不願與中華民國長年的友誼，搶先美國而於同年九月承認中共，並與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斷交後，爲維持兩國間原有的經濟關係，中華民國方面設立「亞東關係協會」，日本方面設立「交流協會」，亞東關係協會在東京及大阪設置辦事處，交流協會在臺北、高雄設置事務所，處理兩國間的實質關係。

二、雙方的交流情況

兩國斷交後，實質的關係不僅依然存續，且有繼續增長的趨勢。例如日本的國會議員及經濟界的代表到中華民國的訪問，以

及中華民國企業界人士到日本的考察，都比斷交前更加頻繁。根據亞東關係協會的統計，日本方面透過該協會的安排訪問中華民國的各界代表年年增加^①。自民黨的國會議員約一八〇人所組成的「日華關係議員懇談會」為加強與中華民國的連繫，促進與中華民國的親善關係，於每年的雙十國慶紀念日都組團來華訪問。另外，民社黨的副委員長中村正雄及最高顧問春日一幸相繼於最近訪華後，亦於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由民社黨籍國會議員二十八人組成「日華懇談會」，由眾議員中村正雄擔任會長，參議員井上計出任幹事長，並將邀請右派勞工團體「同盟」的高級幹部及民間學者、宗教界人士參加，以擴大中日交流。這是除執政的自民黨外，第一個在野黨成立正式的中日親善組織^②。

中日斷交後，雙方的航空路線依然維持到一九七四年七月。後來因日本屈服於中共的威脅，採取對中華民國不利的措施，中華民國乃毅然切斷兩國間的航空路線，日本航空公司也因而喪失黃金路線。直到一九七五年八月日本方面由日本航空公司全額出資設立日本亞細亞航空公司，同時承認中華航空公司的日本路線，於是雙方一度中斷的航行路線乃再行恢復。現在雙方班次往來頻繁，觀光客不斷的增加，此路線更形重要。

中日兩國由於國民所得提高，生活富裕，海外旅行極為盛行。臺灣和日本距離很近，語言上的不便較少，且治安良好，故雙方人民海外旅行時，一般多以對方為第一個希望訪問的目的地。一九七九年一月中華民國開放國民的海外觀光後，到日本遊覽的人數急速增加。根據日本的統計資料，一九七二年由中華民國到日本的觀光客為四萬八千人，僅佔訪日外國旅客總數的七·二%，但一九八〇年已增加到二十六萬二千人，佔訪日外國旅客的一九·九%（表一）。一九八一年一月至十一月累計為三十一萬五千人，全年預估約可達三十三萬五千人，成為訪日外國人旅客的第一位，每人平均在日本的消費額也達到六十五萬日圓^③。另一方面，訪問中華民國的日本旅客在一九七二年為二十七萬七千人，一九七九年達到六十五萬四千人，近一、二年雖略減，但據中華民國觀光局最近發表的資料，一九八二年也達到五十九萬三千人（表二），為訪華旅客的第一位。

在投資與技術合作方面，由於中華民國政治安定，能够靈活運用各種經濟原則，不斷創造經濟奇蹟，並有完善的保障及獎勵投資法規，形成優良的投資環境，縱係外國中小企業亦可預期風險最小，收益極高，而為海外投資最理想之地區，因此頗能吸引日本企業家轉向臺灣投資。根據日本通產省中小企業廳的統計，日本中小企業一九七二年對中華民國的投資僅佔其對外投資總額

註① 根據亞東關係協會的統計，從一九七三年至一九八〇年底止，日本各界代表經該協會的安排訪華的有一八、四三七人。一九七三年為一、三五八人，七四年為

一、四七三人，七五年為二、六二六人，七六年為二、二三六人，七七年為二、五〇四人，七八年為三、二五一人，七九年為二、二六〇人，八〇年為二、八二九人。

註② 「日本研究」月刊，一九八一年一月號「日本政情動態」欄，臺北。

註③ 「朝日新聞」晚刊，一九八二年三月十一日。

的八·九%，而一九七九年已增加至二二·六%，約佔其對外投資總額的四分之一而居首位^④。自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八〇年底止，日本企業來華核准投資件數累計達七五七件，總金額為四億五千七百六十五萬六千美元，一九八〇年核准投資為三十五件共八千六百萬美元，其金額是歷年最高的，比前年增加七二%（表三）。在投資的行業中，以電子及電器製品最多，其次為機械儀器及金屬製品、化學品製造業等。中華民國自日本引進技術為臺灣民間企業技術合作之主流。根據經濟部外國人投資審議會統計，一九五二年至一九八一年十月底止，在累積核准之技術合作案件一、五三一件中，日本佔一、〇四九件，約佔總額的六九%，預計今後將繼續擴大合作。

在中日貿易方面，中華民國佔日本出口市場的第四位，而日本則為中華民國的第二大貿易夥伴。兩國貿易關係極為密切，有下列幾個特徵：

(一)貿易額的增加：在一九七二年雙方貿易額為十四億二千萬美元，七三年為二十二億五千萬美元，至八〇年則增加到七十五億三千萬美元，八一年又增加到八十四億美元（表四）。惟日本對華貿易出口佔其出口總值在一九六〇年代為一·五二%，七〇年代為三·六三%，到八〇年代則為四·〇九%；而中華民國對日貿易出口佔出口總值却由六〇年代的三七·七%，降至八〇年代的一一%，可見中華民國逐漸成為日本主要出口對象，而中華民國對日輸出，則逐年趨於鈍化^⑤。根據一九六〇年至七九年之資料顯示，中華民國對外出口一百萬元，就須向日本進口二十八萬元之貨品，對日進口依賴程度高達二八%。同時中華民國經濟成長一%，自日進口即將增加二·一九%，所佔比率都很高。由於過去二十年來，中華民國平均每年出口成長率高達二〇·三%，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高達九·六%，遂造成自日進口之高速實質成長^⑥。

(二)貿易商品上的特徵：在一九六〇年代後期，中華民國大量發展勞力密集型加工出口產業之際，並未同時建立零件及原料產業，於是造成進口日本的零件及原料，加工製成產品後外銷的現象。一九七〇年代在加強基本工業發展過程中，配合基本工業的產業尚不及開發，更須依賴自日本進口資本財。中華民國自日本進口的主要商品中，在一九八〇年機械類（二五·四億美元）、鋼鐵製品類（八·五億美元）、化學製品類（五·八億美元）、非鐵製品類（二·七億美元）及纖維製品類（二·二億美元）等五個項目，佔該年輸入總值的八七%，重化學工業品一向佔進口的八〇%以上。中華民國對日出口的主要商品，在一九八〇年為水產物（三·五億美元）、纖維製品（三·一億美元）、機械（三·一億美元）、化學製品（一·二億美元）及砂糖（一·一億

註④ 參閱日本通產省中小企業廳一九八〇年九月發行之「一九八一年度中小企業國際化對策概要」第七頁。

註⑤ 張寶樹撰「對中日貿易逆差問題的看法及解決途徑」，〔中央日報〕，一九八二年一月十日。

註⑥ 臺灣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劉泰英在一九八〇年十二月第八屆東亞經濟會議之報告「中日貿易逆差之原因及其解決途徑」。〔工商月刊〕，第二十九卷第一期，一九八一年一月，臺北。

美元)。木材及香蕉在一九七〇年係屬於主要出口產品，但目前其比重顯然已經降低，而機械及纖維製品等加工製品的比重則有提高的傾向。加工製品所佔的比率，一九七二年為三七%，一九八〇年則為五五%^⑦。

(三)貿易逆差的擴大：中華民國對日貿易不但長期處於逆差狀態，而且逆差逐年擴大。根據海關通關統計資料，一九五三年貿易逆差僅五十八萬美元，一九七二年中日斷交時增至六億六千九百萬美元，一九七八年已達二十一億美元，並繼續擴大，一九八一年更高達三十四億四千七百九十萬美元。此項巨大的逆差數額(表四)，已成為中華民國對外貿易之嚴重問題。

表一 訪日外國人旅客數

單位：千人

年 度	總 人 數	中華民國
1975	812	84
1976	915	95
1977	1,028	105
1978	1,039	115
1979	1,113	188
1980	1,317	262

資料來源：「工商月刊」，第30卷2期，1982。

表二 訪華外國人旅客數 單位：人

年 度	總 人 數	日 本
1970	403,756	177,446
1971	466,570	255,699
1972	499,715	277,701
1973	703,775	437,821
1974	702,963	438,911
1975	715,630	419,259
1976	853,875	516,449
1977	933,936	561,166
1978	1,046,916	624,868
1979	1,096,735	693,671
1980	1,111,130	654,413
1981		593,260

資料來源：1. *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 1981.

2. 1981年係觀光局公佈之資料

三、中華民國要求改善貿易逆差

中華民國曾屢次向日本要求正視貿易逆差問題，設法謀求改善，但都沒有收到實際效果。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日本交流協會堀越禎三會長親自率領了一個六十二人之「日本經濟交流促進團」來華，與相關業者舉行座談。中華民國方面本來寄以很大的希望，但因日方沒有採購多少東西而感到失望和不满。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底在東京舉行之第八

註⑦ 伊藤忠商事株式會社常務董事三宅秀乙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第九屆東亞經濟會議之報告「中日貿易問題」。(「工商月刊」，第三〇卷一期，一九八二年一月，臺北。

表三 外人在華投資狀況(核准者)

單位：千美元

年 項 別 目	總 計		美 國		日 本	
	件 數	金 額	件 數	金 額	件 數	金 額
總計	1,262	1,753,716	330	776,285	757	457,656
1953	2	2,041	1	1,881	1	160
1954	5	2,092	3	2,028	1	14
1955	2	4,423	2	4,423	—	—
1956	2	1,009	2	1,009	—	—
1957	4	48	1	11	3	37
1958	3	1,116	—	—	3	1,116
1959	2	145	1	100	1	45
1960	8	14,338	5	14,029	3	309
1961	5	5,964	1	4,288	3	1,301
1962	26	3,543	8	738	16	2,664
1963	16	10,347	9	8,734	6	1,397
1964	13	11,890	7	10,196	2	728
1965	36	35,140	17	31,104	14	2,081
1966	52	20,904	15	17,711	35	2,447
1967	107	38,666	18	15,714	76	15,947
1968	122	53,445	20	34,555	96	14,855
1969	171	81,938	30	27,862	75	17,379
1970	11	109,165	16	67,816	51	28,530
1971	44	125,148	18	43,736	18	12,400
1972	52	100,190	17	37,307	26	7,728
1973	150	193,688	29	66,876	92	44,599
1974	83	108,736	21	38,760	50	38,901
1975	41	70,940	12	41,165	22	23,234
1976	45	102,032	8	21,767	26	30,760
1977	50	95,186	17	24,242	20	24,145
1978	66	136,719	18	69,765	43	50,336
1979	73	181,483	19	80,375	39	50,462
1980	71	243,380	15	110,093	35	86,081

資料來源：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 1981.

表四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額

單位：千美元

年 度	總 計			本 國			美 國		
	輸 入	輸 出	差 額	輸 入	輸 出	差 額	輸 入	輸 出	差 額
1953	191,700	127,608	-	58,709	58,127	-	74,124	5,334	-
1954	211,433	93,299	-	70,721	47,427	-	98,069	5,010	-
1955	201,022	123,275	-	77,747	73,322	+	95,543	5,400	-
1956	193,696	118,296	-	70,281	44,007	+	81,399	6,688	-
1957	212,243	148,285	-	70,410	52,256	-	84,650	5,222	-
1958	226,188	155,814	-	89,452	65,310	-	84,369	9,716	-
1959	231,441	156,906	-	93,365	65,122	-	83,506	13,524	+
1960	296,760	163,982	-	104,855	61,766	-	113,108	18,853	-
1961	322,116	163,982	-	99,754	56,508	-	130,844	42,780	-
1962	304,110	218,206	-	103,846	52,048	-	115,404	53,168	-
1963	361,636	331,665	-	107,266	105,104	-	150,517	53,897	-
1964	427,968	432,956	+	148,929	133,608	-	138,990	80,644	-
1965	556,011	449,682	-	221,319	137,599	-	176,372	95,680	-
1966	622,361	536,270	-	251,443	128,839	-	166,335	115,885	-
1967	805,832	640,730	-	326,050	114,648	-	217,302	167,815	-
1968	903,280	789,189	-	361,612	157,578	-	291,752	178,194	+
1969	1,212,698	1,049,365	-	535,868	215,625	-	363,839	399,047	+
1970	1,522,951	1,481,436	-	652,783	245,029	-	408,159	859,200	+
1971	1,843,938	2,060,393	+	827,023	215,625	-	543,424	1,251,317	+
1972	2,513,502	2,988,123	+	1,046,002	376,758	-	952,533	1,677,106	+
1973	3,792,496	4,483,366	+	1,427,697	823,784	-	1,679,905	2,036,638	+
1974	6,965,757	5,638,993	+	2,214,948	844,005	-	1,652,129	1,822,737	+
1975	5,951,650	5,308,771	-	1,812,220	694,234	-	1,797,540	3,038,639	+
1976	7,598,931	8,166,340	+	2,451,459	1,094,754	-	1,963,852	3,636,250	+
1977	8,510,887	9,360,710	+	2,642,984	1,120,070	-	2,376,063	5,010,378	+
1978	11,026,931	12,687,140	+	3,678,051	1,248,576	-	3,360,797	5,652,243	+
1979	14,773,700	16,103,426	+	4,561,431	2,248,576	-	4,673,486	6,760,300	+
1980	19,733,135	19,810,618	+	5,353,230	2,173,440	-			
1981				5,924,700	2,476,300	-			

資料來源：1. *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 1981.
2. 1981年係行政院主計處公佈資料（「中央日報」，1982, 1, 10）。

屆東亞經濟會議上，中華民國代表亦強烈要求日本方面積極設法縮小兩國貿易差距。於是雙方決定在該會議下設置「中日貿易平衡委員會」，開始協商研討具體的解決方案。一年多以來，中日貿易平衡委員會曾按行業的種類，個別成立十四個相對的商品小組，並編列三百四十六家廠商的商品清單交給日方委員研討，並就其銷日可能性逐項提供說明與建議。日方則同意邀請「日本製品輸入促進會」(MIPRO)協助，並希望中方加強「遠東貿易中心駐日辦事處」的組織與功能，使能相互配合，可惜至今仍無具體的成果。

中華民國經濟部國貿局長邵學錕在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即提出警告說：「中日貿易逆差已擴大到我們不能忍受的程度，如果日本不立刻採取具體行動，增加向我們採購，改善逆差，將迫使我國政府採取限制日貨進口的措施」^⑧。一九八一年二月間，中華民國有關經貿主管機關即會商決定，凡民營廠商向日本採購商品價值逾二十萬美元者，一律勸導改向日本以外地區採購^⑨。

一九八一年三月臺灣省主席林洋港應日本「內外新聞社」(會長木內信胤)的邀請赴日訪問。十七日中午在東京希爾頓大飯店以「中華民國的國策與對日本的期待」為題發表演說，其中提到中日貿易不平衡的情形，謂「中日間貿易逆差，如無法獲得有效改善，則很容易轉變為情緒化、政治化的問題，雖然經濟問題不能以感情來處理，但長久的無法改善，總是會傷害到兩國人民的感情」。因此他要求日本改善，並指責日本對中華民國農產品進口的嚴格苛刻的限制，有失國際貿易對等互惠的原則，日本應在行動上表示誠意^⑩。

一九八一年四月中華民國政府指示中日貿易平衡委員會在六年之內設法消除中華民國對日本的貿易逆差，並以每年減少五億美元逆差為目標，必要時採取限制日貨進口措施，用以達成此一目標。中日貿易平衡委員會並將政府此項指示，轉告日本各大商社駐華代表，希望日本方面正視此項趨勢^⑪。

中華民國方面一再呼籲要求改善，可是一直沒有得到預期的效果和反應。甚至於一九八一年日本政府又把絲織品和鰻魚的進口數量加以限制。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理事長辜振甫說：「我們把在其他國家所賺的錢全部加起來，都可能無法彌補對日貿易的逆差，但日本却要求我們削減鰻魚的出口一五%，絲織品的出口也被減少三、四成。由這種態度可以看出日方毫無誠意。」他也指摘日本對改善貿易逆差的態度冷淡^⑫。中華民國經濟部不得已在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三日斷然宣佈禁止日本一千五百三十三種消

註⑧ (聯合報)，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註⑨ (中國時報)，一九八一年二月九日。

註⑩ 臺灣省主席林洋港的日文演說全文載於《中國與日本》月刊，第二四六期，一九八一年八月十五日，臺北。

註⑪ (經濟日報)，一九八一年四月十七日。

註⑫ (每日新聞)，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七日記者高松紀夫的專欄。

費品與大型汽車及其零件等貨品進口。二月二十三日經濟部長趙耀東在立法院答覆立法委員的質詢時指出，歷年來中日貿易逆差嚴重，雖經多次交涉但均無顯著效果，在不得已的情形下，實施了管制日本消費品進口的措施，以喚醒雙方政府和民間的重視和努力。他並表示，此次管制進口的消費品貿易金額只有一億一千萬美元，在中日貿易逆差金額中所佔的比例微乎其微，但是這可代表政府的決心，和對問題的嚴重性表示關切^⑬。

對中華民國政府的此項措施，日本交流協會臺北事務所所長人見宏於三月四日往訪亞東關係協會理事張研田，轉達日本政府方面的見解，對事先未就此事照會日本表示抗議，並要求立即撤銷這項措施，不然日方恐怕不得不採取停止提供中方關稅上優惠等措施^⑭。至此，兩國貿易關係已發展成政治化的問題，誠感遺憾。日本是否會採取進一步的報復措施或拿出誠意設法改善，這要看日本政府的明智選擇了。不過，中華民國方面一再表示，現在所採取的措施是一種手段，而非目的，如日方有誠意改善逆差問題，並確有改進效果時，這項限制措施將立即再作檢討。

四、清除貿易不平衡為中日的主要經濟課題

中日兩國貿易的逆差是長期以來的現象，隨着中日兩國經濟的迅速成長，乃逐漸擴大，演成今日的情況。國與國間的貿易，當然不可能要求絕對的平衡，某種程度的不平衡是免不了的。可是國際貿易必須遵從平等互惠的原則，必須是有來有往的交流，而不能有出無進，變成單向的商品流動。目前美國和日本之間的貿易逆差達一百八十億美元，美國已強烈的對日本表示不滿，要求速謀改善。而中日間的貿易逆差若以美國的經濟規模換算的話，將相當於五百億美元，其嚴重性也就可想而知了。此種情況若繼續擴大，則中華民國勢必採取更嚴格的進口管制措施，中日兩國均將蒙受到不利的影響，因此亟須謀求有效的解決途徑。

造成中華民國長期對日貿易逆差的原因，主要有下列幾項^⑮：

(一)在地理上兩國相鄰，交通便利，運費負擔較輕，而且日本售後服務與零件的補充迅速。加以文化背景相同，互相通曉對方文字者較多，交往方便。日本的产品品質良好，又較歐美產品稍廉，因此一般多願向日本購買。

(二)一九六〇年後，中華民國積極發展勞動密集之輕工業，並快速拓展外銷，以帶動國內經濟之加速成長。此時日本大量供應中華民國廉價之中間產品及機器設備，以致中華民國對日輸入之依賴程度日益提高。一九七〇年後中華民國加強發展基本工業，

註⑬ (中國時報) 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註⑭ (聯合報)，一九八二年三月五日。

註⑮ 參閱註⑤和註⑧。

由於與基本工業相配合的產業開發無法滿足需要，更須依賴自日本進口生產設備及原料。

(三)在經濟技術合作方面，日本對中華民國的投資或技術合作，多以較落後之生產設備及技術輸出，並自日本進口中間原料和零件，加工或裝配後輸往第三國，甚少以高級技術或設備引進中華民國生產日本所需產品，故回銷困難。

(四)日本採取農業保護政策，對農產品的輸入有很多限制，以及嚴苛的關稅和非關稅障礙，使得中華民國的農產品和其他工業產品的對日輸出困難。日本的農民佔其人口總數不到七分之一，大部份還是兼業農民，但因執政的自民黨議員有六〇%以上與農業有關係，為爭取農民的支持，在農產品的輸入上，加上種種非關稅障礙，例如每個蒜頭要六瓣，洋蔥要一樣大小。過份嚴格的尺度和要求，使中華民國農產品輸往日本受到相當的阻礙。

(五)中華民國和日本均屬天然資源缺乏的國家，日本所需的能源和天然資源，中華民國均無法供應，而主要對日輸出的農產品和輕工業等民生用品，附加價值不高，又受到鄰近國家激烈的競爭，獲益率低。中華民國自日本輸入者，却多係附加價值高的精密產品或生產設備，貿易逆差因而形成。

從上所述，可知貿易逆差的形成主要是長期性的產業結構問題。減少中日間的貿易不平衡，有待兩國政府及民間通力合作，共商解決之道。在近程方面日本應解除對中華民國的農產品設限、降低關稅以及撤銷不合理的非關稅障礙，擴大對中華民國的採購。中華民國則應加強對日消費市場的調查研究，分析日本市場的型態、消費者的愛好、流通機構及方式、以及日本的各種法規，並在企業管理上設法降低生產成本，加強品質管制，滿足日本消費市場的需求。

日本在對外貿易上，不僅對中華民國有大量的貿易出超，對美國及西歐等重要國家亦有大量的出超，因此美國及西歐等國亦不斷要求日本開放市場、降低關稅以及解除不合理的非關稅障礙。日本的非關稅障礙（NTB）是多方面的，商品輸入時要重新接受各種檢查和試驗，審查時應繳很多附件，手續繁雜，而且費時頗長，即使通過此等難關，上市銷售，由於日本流通機構複雜，售價將較輸出國價格高出很多，仍然難以暢銷^⑭。最近美國表示，為對抗日本的貿易保護政策，將採取相互主義，擬定法律措施。日本政府於是決定改善五十八項非關稅障礙，以舒緩美國的不滿^⑮。一九八二年三月四日美國政府向參院小組委員會聽證會公佈兩種與美日貿易摩擦問題有關的日方貿易障礙清單。該清單揭露日本大藏、通產及厚生各省所作的行政指導情形，指其為貿易障礙而加以抨擊^⑯。

面對國際上許多國家要求日本開放市場的壓力，自民黨已開始研擬開放市場的方策。中華民國應該配合此一情勢，設法溝通

註⑭〔產經新聞〕，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註⑮〔讀賣新聞〕，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五日。

註⑯〔每日新聞〕，一九八二年三月五日。

，努力爭取，要求日本放寬對臺灣產品的限制，並擴大採購。

在遠程方面中日雙方應擴大技術合作，試行產業分工，鼓勵日本廠商來華投資設廠，生產日本國內需要的產品。隨着日本產業的發展和工資的高漲，日本可將國內生產已不經濟的產業轉移至中華民國生產，而將產品的全部或一部份回銷日本，則不但可以減輕消費者及生產者的負擔，擴大雙方的貿易，亦可有效地縮小貿易的逆差。再則，在政策上設法引進歐美等工業先進國家的尖端科技及高度的生產技術，注重和鼓勵研究發展，提昇工業水準，使中華民國所需要的中間原料和零件能够自給自足，減少仰賴自日進口，不再停滯在零件裝配的水準，達到技術升級的目的。總之，以加強合作、擴大出口來消除不平衡的現象，才是正確有效的解決辦法，才不會對雙方帶來不良後果。

五、日本必須改善對華態度

戰後中華民國一向對日本採取友好的態度，與日本在各方面維持緊密的關係，長期以來所建立的深厚基礎，即使一九七二年斷交之後，仍然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如前所述，中日兩國在人事的交流、民間的往來、經濟技術的合作以及貿易的關係等方面依然繼續擴大。今日兩國的貿易不平衡，已經是到了嚴重的程度，中華民國要求改善，日本應該表現誠意，積極配合才對。可是，日本不但未如此作，反以從中華民國所賺取的外匯去援助中共的現代化，這是令中華民國無法忍受的。日本「產經新聞」社長鹿內信隆一九八二年元旦在該報發表的「新年感言」中說：「中華民國在第二次大戰結束時，對戰敗的日本以德報怨，採取寬大為懷的政策，阻止了日本被同盟國共同佔領，保留了天皇制，放棄了賠償要求，並及早將戰俘及日本平民自中國大陸遣回日本。這些寬大措施，成爲今天日本繁榮的原動力和基礎。」接着他又說：「美國雖與中華民國中止了外交關係，但通過了臺灣關係法作爲彌補，而日本政府對以前的恩人却視若無睹，一切表現完全像個忘恩之徒。尤有甚者，日本現在每年對中華民國貿易順差高達三十億美元以上，却毫不採取行動加以矯正。」鹿內信隆以日本人的立場，對日本政府的這種行爲和政策加以嚴厲的批評，是日本當局應該重視的。

中日斷交後，兩國外交的管道被切斷了，而日本新聞界並沒有負起反應真實情況的責任，也使兩國間存在的問題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例如，中華民國是一九八〇年日本商品的第四大買主，對日貿易入超接近三十二億美元，但是「日本經濟新聞」在不久前一系列的亞洲經濟專文中，却不提到中華民國^{註⑨}。臺灣省主席林洋港在一九八一年三月間赴日訪問演說時也提到這個問題。他指出日本的新聞界對中華民國和中共常常有不公平的報導，對中華民國故意不加報導，或以片面的見解作不利的報導，長期地

註⑨

〔中央日報〕，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八日。

對中華民國作歪曲新聞報導。最近雖有若干的改善，但為加強兩國的友好關係，增進彼此的了解，期待日本新聞界抱着公平、公正的態度，對中華民國的事務作客觀的報導，讓大眾明白真實的情況。

一九七二年九月日本與中共完成所謂的關係正常化以後，就以獲得中國大陸廣大市場的美夢為樂，並期待從中共得到石油，以解除能源危機，完全不顧有長期深厚關係的中華民國的立場。日本的這個美夢，在中共一連串的毀約聲中，受到很大的挫折，却仍然提供三千億日圓的援助，曲意討好中共。這是因為日本犯了一個基本戰略上的錯誤：以為拉攏中共可以對抗蘇聯在亞洲的勢力，對安定亞洲的局勢有所幫助。

事實恰好相反。思想、價值觀念以及國家體制相異的國家，倘僅因軍事戰略上的需要而匆促接近，其關係不但不能持久，並將加深周圍的緊張。一九七八年日本與中共締結和平友好條約，列入反霸條款後，蘇俄隨即在日本固有的北方領土擇捉、國後島上建設軍事基地，威脅日本。同年十一月蘇聯又與越南簽訂友好條約，在東南亞的一角確立蘇聯的軍事地位。一九七九年一月背後有蘇聯支持的越南軍隊侵入高棉，同年十二月蘇聯也派兵入侵阿富汗，造成今日亞洲動亂的局勢。在這種情勢下，美國擬利用中蘇共的對立，採取接近中共的政策，來阻止蘇聯勢力不斷的擴張，並且要求日本也負起分擔西太平洋防衛的責任。日本在美國不斷的防衛要求下，答應盡「更進一步的努力」，擴大海空防衛的範圍，提高防衛預算經費，增強防衛力量²⁰。日本已經完全被捲入對抗蘇聯的美、日、中共的「三角同盟」中了。要知道中共與蘇聯同為共產政權，其赤化世界的野心不會改變，美國和日本援助中共，一旦中共軍事力量強大，對亞洲地區將造成更大的威脅，對日本的安全也將帶來嚴重的危害。

中華民國在政治制度上與美日兩國相近，同屬民主自由國家；在經濟貿易上同是美日兩國的重要夥伴；在戰略方面，臺灣的地位可以壓制由蘇聯本土駛赴越南的蘇聯軍艦。中華民國處於對蘇戰略的第一線，由日本、韓國、中華民國、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澳洲、紐西蘭組成的新太平洋安全機構，才是對蘇最有效的戰略部署。基於這種認識，美國雷根總統上臺後，已表示將根據「臺灣關係法」改善對中華民國的政策，加強兩國間的關係。而日本政府却想在美國對中華民國的武器銷售上，充當中共的說客，實屬不智。日本應該認清與中華民國關係的重要，站在維護自由民主主義的立場與兩國的長遠利益上，重新調整對中華民國的政策，進一步升高交流的管道，才是對待朋友的正確態度，也才是對日本本身最有利的作法。

六、結 語

註²⁰ 拙著「日本防衛與美日協調」，〔問題與研究〕月刊，一九八一年十月號。

戰後三十多年來，日本在美國的保護下，埋頭致力於經濟的復興，造成了今日的奇蹟，成爲經濟的大國，實在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可是在政治的表現上，日本却往往只顧一己眼前的利益，而不管盟邦的立場和處境，更不願負起在國際社會上應盡的責任。因此在維護自由民主國家陣營的防衛分擔和改善貿易不平衡的態度上，日本就顯得被動和消極，也因而備受指責。今後日本要走上政治大國的路，必須負起與其經濟力量相配的角色，站在共同安全保障的立場，自動地改善與民主國家間的關係，協助其解決經濟上的難題，以表現日本的誠意。尤其對於在地理、歷史、文化和經濟貿易上都與日本有密切關係的中華民國，日本必須表現誠意和必要的關心，對目前日趨嚴重的貿易不平衡，更須積極地與中華民國共謀解決的辦法。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二日脫稿)

補註

根據日本法務省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日所發表之一九八一年度出入國統計，該年度赴日本之外國人總數，共一百三十三萬七千二百人(增加二二·四%)入國者人數依國別計，以美國三十一萬人(增加二·八%)爲最多，其次爲中華民國三十萬五千人(增加二九·五%)佔第二位。該項統計數字不包括再入境者。
(朝日新聞)，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